



开放人文

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插图本)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Arnold Toynbee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历史研究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研究: 插图本 / (英) 汤因比 (Toynbee, A.) 著;

刘北成, 郭小凌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A Study of History

ISBN 7-208-05560-2

I. 历... II. ①汤...②刘...③郭... III. 史学-研究 IV.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805 号

责任编辑 范蔚文

特约编辑 顾兆敏

版式设计 王晓阳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历史研究(插图本)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0.75

插 页 44

字 数 965 000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560-2/K·1101

定 价 8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序 言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就时间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演变成人之后的最初50万年或大约100万年时间里，^①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骼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晚近的时代。从地理上对历史进行全球性考察，较从时间上考察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即使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也应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对它表示关注，因为好奇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繁荣且有着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们仍应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感到惊异。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实现过这两个理想的目标。

我是积个人经验认识到这一点的。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从我能记事的幼年起，我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对历史的兴趣感染和激励了我。我也是在曾经当过水手的叔爷的影响下长大的。他曾是一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种三桅横帆的海船）的船长。有关他远航至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曾令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当我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也正是这一事件使我察觉到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可行方法，而史料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1914年我在牛津大学教书，讲授古典希腊的历史。那一年的8月，我的头脑突然闪出一个想法，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体验到了现在令我惊诧的东西。他同我一样，为他所在的世界分崩离析、各邦间展开相互残杀的大战所震撼。修昔底德已预见到，他那一代经历的大战开启了他当时所处世界的新纪元，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我现在看到，古典希腊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我们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比较研究。不久我还发现，希腊史和西方史乃是同类事物的两种范例，该类事物还有一系列其他样板。我当时计算出21种文明，现在抛开一些已灭亡的不算，我则统计出至少有31种文明。对于比较研究来说，20或30个样本足以说明问题了。

教导我广泛研究历史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叔爷，修昔底德以及另外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波里比乌斯。这两个人也写过他们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广泛的世界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对死记硬背英国各郡的名称和英国历代国王的生卒年代感到厌烦。而以色列和犹太^②的国王据称作恶多端，几乎乏善可陈，却激起了我对他们的邻人——亚

述人和埃及人——的好奇心。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古代居民留下的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纪念物。我对希腊与拉丁文献,包括诗歌、哲学与历史文献的认真钻研,拓宽了我的思路。1914年8月,修昔底德曾给我过一个至今仍未摆脱的震撼。在1915和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从1920至1972年,我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写作。在1920年的夏天,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但未获成功。1921年夏,我在伊斯坦布尔到卡来斯的火车上,草草拟定了各部分的题目,其中大多可在这部修订插图本中找到。未经删削的全本共计12卷。自1927至1939年,我抢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赶写这本书,在大战爆发前40天出版了头6卷。1954年我又出了7至10卷,1959年第11卷(《历史地图和地名集》)问世,1961年则出版了第12卷(“反思”)。

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一书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本中,我同样是二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这部《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是相互合作的产物。它的问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之间一项协议的结果,由简·卡普兰小姐和我共同完成。

本书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12卷本,也不同于D.C.索麦维尔根据前10卷所摘编的节本。

这是头一部插图本,配合文字说明的各幅插图赋予这部书以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插图是由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的布鲁克纳太太收集的,而从布鲁克纳太太提供的图片中挑选一部分作为本书插图的工作,则是同卡普兰与我商量后

才进行的。插图说明词由卡普兰小姐起草,经过了我的首肯。

在卡普兰小姐发现并填补因时间拉开的空白以及在布鲁克纳太太为卡普兰与我合编的这个新版本配图之前,都必须熟识本书原版的布局和内容。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对完成此项任务的这两位同事表示深切的感谢。她们勤恳的工作使得眼下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这个修订本是我独自难以完成的。如我先头所说,这是一部合作的产物。但在指出这一点时,我需要做一点保留说明,即对本书的批评应是仅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思想与我的这两位同事的研究相比,要更薄弱一些。

目前这个版本同索麦维尔的版本一样,是一个删节本。但本书的删节依循不同的思路。书中能看到索麦维尔的节本和原书前10卷所没有的一些课题。经索麦维尔压缩的版本成功地再现了初版头10卷的整体结构,却不可避免地舍弃了我的大部分历史例证,而那正是我的论点的支撑。现在这个版本则收入了初版当中的那些例证,而且还有可能保留了更多的细节。作为补充卷的第12卷(“反思”卷),现在也被头一次纳入本书的主要内容当中。

本版还有了讨论1961年“反思”卷问世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及发现的可能。例如,讨论了战争艺术虽不断“更新”,却令人啼笑皆非、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终结)。先前无人知晓的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地方文明史也同其他地方文明并列在一起,被赋予了适当的位置。1927年,当我开始为本书头10卷做笔记的时候,人们以为热带非洲和南非,在阿拉伯人与西欧人到来之前,一直是个无历史的地区。但从那以后,一方面因考古发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因对早期幸存下来的文献证据进行认真研究的缘故,这一非洲主要部分的历史被重新找了回来。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技术拥有堪与西欧的相关历史媲美的历史。东亚的早期文明史,东亚各个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相当清晰的焦点。我们在埋头劳作时,中国则一直在世界主要事务中重新扮演着正常的角色。在目前这个版本的研究中,我们试图记述这些或其他有关人类事务的新增知识以及新近的理解。

在古希腊的两部伟大史诗之一《奥德修记》中,有一个关于海神普罗泰乌斯(Proteus)^③被一位叫迈奈劳斯(Menelaus)^④的希腊流浪者绑架的故事。迈奈劳斯自特洛伊战场返家途中迷了路。如果绑架者将普罗泰乌斯抓牢不放,他就会被迫告诉绑架者有关他们的命运。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普罗泰

乌斯对付绑架的办法是不断变形。英语中的“变化无常”(Protean)一词便由此而来。历史就是变化无常的事物。你还没有抓住一种形态的历史,它已经像普罗泰乌斯一样改变了自己的形状,有时简直变得面目皆非。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不断地增添自身。从1914年8月我最初产生撰写这部著作的冲动时起,到目前这一卷的面世,历史已经增添了不只58年的内容。每一次的增添都改变了历史的整体,因为整个过去都由于我们新的生活经验而显得有所不同。譬如,对我来说,修昔底德笔下的希腊,在1914年8月看上去就与1914年7月有着差异,因为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对以往世界史的总和确实增添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令人震惊的,但它的奇特性却不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些其他突发事件,也同样改变了历史的整个面貌。例如,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政治统一;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跨越赫勒斯滂海峡;公元633年,阿拉伯人突然越出阿拉伯半岛;蒙古人在13世纪自东北亚大草原的突然崛起。还有一些更加令人吃惊的事件是逐渐发生的,如希腊和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太一神教的形成,宗教传教团体的传布,农业的扩散,水利的利用等等。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创造新事件、改变过去的整个面貌上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同时,我们的时代大概也有两点与先前时代有所不同。

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致使变化以空前的速度加快进行。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我们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已逝的过去变得越发令人捉摸不定。它的面貌不仅因我们日新月异的新经验而一直在变化,而且因考古学家们的新发现而一再发生更动。考古学家们不断有革命性的新发现问世,并且不断对他们先前的发现予以革命性的新诠释。他们用变化无常来弥补四平八稳的不足,而考古学理论方式的剧烈变更则突出了考古学家们对过去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无论如何,这种转变是因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知识的增加而应运而生的。

自从拿破仑于1798年侵入埃及以来,在美洲以及在旧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尽管不太一帆风顺,但对诸文明的比较研究毕竟已做出不可缺少的贡献。

从那时起,考古学家们已发掘出一些文明的遗迹,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马雅文明,以及中国的商代文明。这些文明本来已经彻底湮没无闻了。他们还通过破译古埃及的文字记录复活了法老时期的埃及文明,这一文明的大量古文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他们随后又破译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迈锡尼文明以及中国商朝的文字记录。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各个文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已不再是难以接近的了,它们增加了已知文明的数量,使得比较研究各个文明成为可能。同时,考古学家们一直在不断修改着文明行将兴起时的历史面貌,其变更之速,毫不亚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独裁者、征服者对20世纪历史面貌的变革。

基于这些理由,本书现在这个版本与1934至1954年间出版的原10卷本有着广泛的不同之处。基于同样的原因,目前这个版本由于历史事件的长河不断地流动以及知识的持续增长注定也会过时。只要人类继续存在,无论历史还是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不可能永恒不变。如果本书有助于读者对既令人畏惧又令人着迷的人世变迁采取一种全面的看法,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阿诺德·汤因比

① 汤因比显然认为真人或晚期智人之前的猿人时期不属于人类史的范畴,这同古人类学界中存在的部分观点相一致。但就多数人的意见而言,人类史的开端被设定在能人即制造工具的人形成时期,时间约在200万年前。——译者注

② 犹太王国(Judah)旧译为犹太王国,显然与原词发音及含义不符。——译者注

③ 普罗泰乌斯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记》4章354—359行)是一海中老人,海神波赛冬的仆从,具有未卜先知和变形的能力,经常在帕洛斯岛休息。迈奈劳斯从特洛伊战场返家途中迷失航路,困在帕洛斯岛。普罗泰乌斯之女埃多塞雅帮迈奈劳斯紧紧抓住其父,最终使迈奈劳斯返回家园。在晚后的传说中,如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犹里庇底斯的剧本《海伦》中,普罗泰乌斯则是波赛冬的儿子,埃及国王。——译者注

④ 又译墨涅拉依、曼涅劳等,斯巴达(与后来的斯巴达非一国)国王,传说中的希腊霸主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之弟。其妻海伦为绝代佳人,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遂引发希腊亚该亚人群起围攻特洛伊的战争。——译者注



彩图 1
主观性：一种偏颇的观点

人们大多看到的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事物，他们大多记载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从一位现代地理学家的立场来判断，这幅13世纪的曼迪地图(Mappa Mundi)是可笑的，但从图本身来说，它却是有关一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情合理的画面。在一个圆平面的顶部是东方——基督教的发源地——那里画有伊甸乐园和亚当、夏娃，下面是耶路撒冷。欧洲、非洲和亚洲都被方便地集中在一个图案里。这个图案包含了该时代的某些地理知识，但绝不是全部。结果这是一个哲学模式，而非是对旅行者的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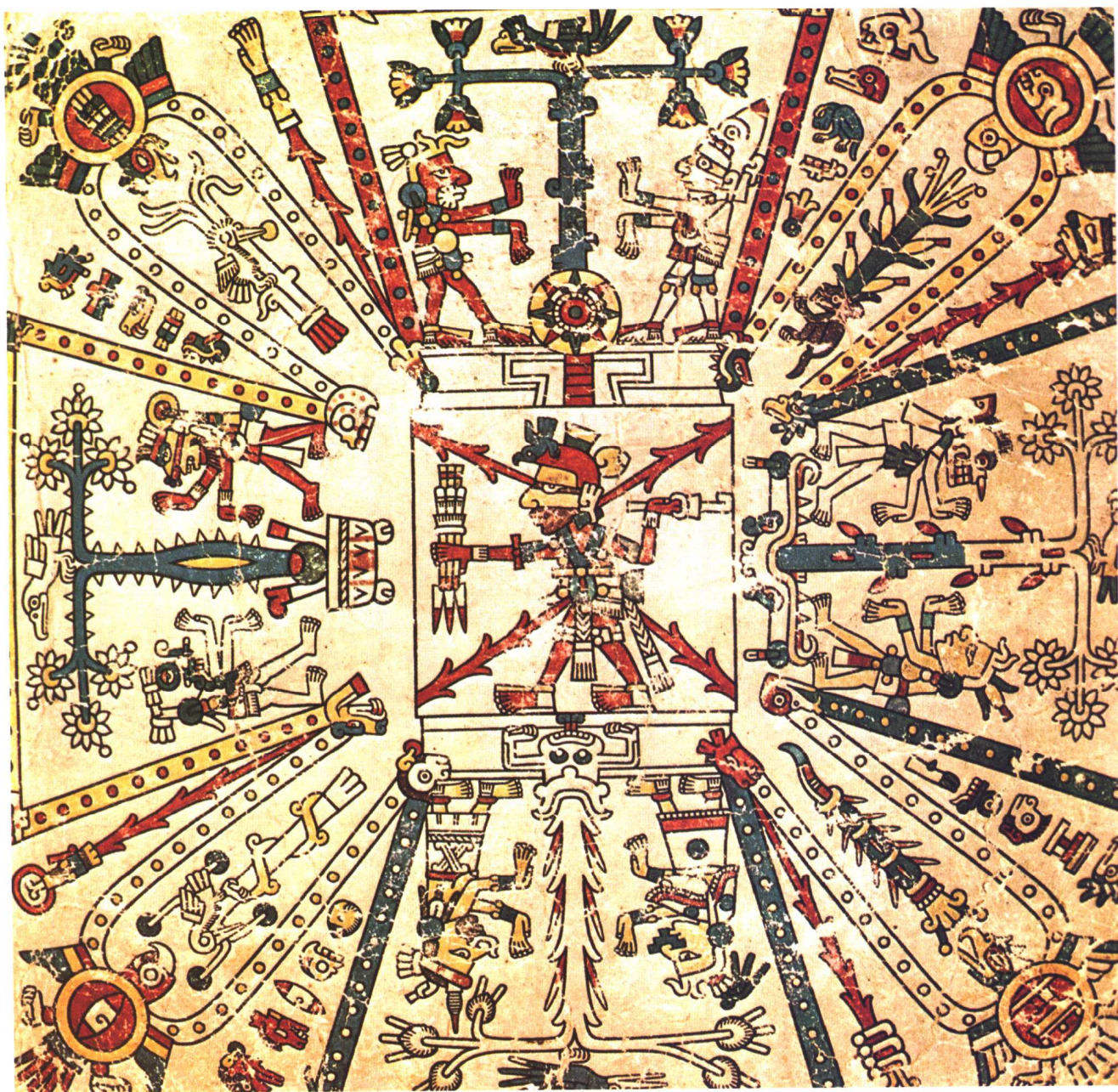


彩图 2、3

主观性：统一中的多样性

相同的宗教信仰可能对同一事务予以全然不同的文化解释。上图是17世纪埃塞俄比亚的一幅“耶稣自十字架上被取下”的绘画，是根据当时该地的传统描绘的情景。右图是一位印度16世纪莫卧儿人(Mughal, 即征服印度的蒙古人。——译者注)画家的作品，它试图忠实地模仿欧洲人的样式，但圣母和她周围的人却仍是印度人的模样。





彩图 4、5
“固定宇宙”：关于世界的各种模式

在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对某种模式的需求简直同人类一样古老。这幅阿兹特克人关于五个世界区域划分的“地图”(上图),用红点分出四个过去的世界,中央是现在的大地。每个世界都有一位指导其历史的神来代表。彩图5是佛教的曼荼罗,刻画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几何状的图表有助于对神秘的终极实在的思考。





彩图 6、7
希腊和中国模式

希腊文明为一个连续发展的模式提供了证据，因此这位基督教修行者看上去像是从希腊的石柱上长出来似的，它是一个新的、与有联系的基督教文明已经呱呱落地的象征。

相反，中国史却以统一和分裂、有序和失序、进步和衰落轮流交替的模式为标志。右图的中国哲学家们正在研究体现这种螺旋运动的阴阳图，阳等于活力和主动，阴象征惯性和被动。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把这种希腊与中国模式结合起来，创造一个适用于其他文明历史的现实模式。



